

說說巴塞爾

何 婕



文化 什錦

說起巴塞爾，藝術愛好者都不太陌生。這個位於瑞士、德國、法國三國的小城市，每年都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收藏家、策展人、美術館負責人和衆多藝術愛好者聚集此地，參加被公認為當今世界上最高水準的藝術展——巴塞爾藝術展（Art Basel）。

對收藏家和藝術品愛好者來說，拜訪這個世界上最盛大的藝術展是必須的；而對畫廊來說，能夠參加巴塞爾藝術展是一種榮譽。每年世界上會有上千家畫廊申請參加巴塞爾藝術展，但是主辦方只從中挑選三百家左右的資深畫廊，經營三年以上的畫廊才有資格申請，巴塞爾藝術展堅持參展作品的藝術標準。

自一九七〇年第一屆巴塞爾藝術展開始，每年都會有許多畫廊慕名參與卻最終無緣前往巴塞爾。而隨着亞

洲藝術市場的勃起，在巴塞爾藝博會的名單上，中國藝術家的亮相則逐年增多，在第四十一屆藝博會上，李松松作品亮相PACE畫廊，朱昱的作品出現在蘇黎世畫廊。能參加巴塞爾藝術展，這不僅意味着可以利用巴塞爾藝術展提供的平台，在國外傳播畫廊的聲名，接觸更多的藏家，達成更多的交易；同時意味着，能參加巴塞爾藝術展的畫廊是被藝術家所青睞的。

二〇一一年，巴塞爾藝術展進軍亞洲市場，好比十年前瞄準邁阿密一樣，將目光聚焦在了香港。自二〇一三年之後，每年三月末，香港的Art Basel便成為了亞洲乃至全球藝術界的一大焦點，為香港成為亞洲藝術交易中心添上了含金量十足的一枚砝碼。

巴塞爾藝術展受追捧的現象不僅代表着人們對藝術的追求日益提高，也折射出藝術購買者的興趣和實力不容小覷。開展在即，今年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依舊讓人期待。



閒 旅 人

大概十年前我在香港大學工作時曾領導學生到佛山考察，那時看見一個非常進取的城市。佛山為求發展，當年提出「廣佛同城」的概念，希望與周邊的大城市共享同等的繁榮豐盛。近年與內地的達人閒聊下，我發現廣州現在亦有人開始羨慕佛山了。我沒有親自調研，無法考證實況，但是有口碑還是一件好事。內地的城市爭取發展的機遇，目標為了爭取國家所分配的資源，可是香港人的心情比較複雜。香港是一個

香港文化如何進入大灣區？

陳劍梅

國際大都會，一直以來香港人都喜歡爭取世界經濟地位的排名，面對發展大灣區的機遇，顯得多少有點疑慮。

二〇一七年有關中央政府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計劃公布時，我參與了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為此而辦的研討會，期望了解香港在這一個大趨勢之下的前景。當天嘉賓陶冬的分析中肯，表示發展大灣區的確有心為香港人，因此這一點我確信。

關於特區政府這一方所推動的人文大灣區的工作，我卻抱持觀望的態度，因為在大灣區發展商業經濟活動與推廣文化產業是截然不同的，就算特區政府努力協助，香港的

藝術團體又參與，我們面對文化差異的問題亦不少。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在大灣區建立支持香港製作的觀衆群呢？應該怎樣培養觀衆去接受我們的文化呢？我不是指香港人所繼承的西方藝術形式，而是香港原創的作品及傳統藝術。

三月二十二日獲康文署邀請參與粵港澳大灣區演藝交流會，看見主辦方的努力及誠意。主辦方更宴請內地營運表演場地的政府及民營機構，讓香港的參加者了解在內地巡演的可能性。就是說我們進入大灣區，硬件和軟件都齊備了。可政府還尚欠一個文化定位。

巴金：重返歷史現場

李 輝



▲八十年代，本文作者與陳思和（右）一起訪問巴金（中）作者供圖

時光遠行，巴金忽然間發現自己竟然走過一條漫長的曲折道路：「我怎麼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麼遠離了自己曾經讚美的人格？我怎麼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

精神痛苦，再次成為晚年巴金寫作的動力，這與當年二十三歲在巴黎寫下《滅亡》時的精神狀態頗為相似。一九八〇年四月，他前往日本訪問，在京都發表一次題為《我和文學》的演講，其中明確說過「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彷彿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隨想錄》之〈我與文學〉）

於是，巴金重新拿起了筆。歷史的風風雨雨，朋友們的坎坷命運，自己的人生體驗



▲九十年代初，本文作者採訪巴金（左），聽他談沈從文 作者供圖

，在他的筆下一一呈現。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喪失自我。他直面「文革」浩劫，直面自己曾經扭曲的人格，願意用真實的寫作來揭示自己的、乃至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傷痕。

看巴金在《隨想錄》中一步一步前行。他不厭其煩地強調「講真話」——一個看似淺顯卻極具現實分量的命題。他站在整個人類的角度反思「文革」，第一個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想。「傷痕文學」正在盛行時，他率先自我懺悔和自省，超越個人苦難的訴說，提出每個知識分子乃至每個人，都應反思自己的歷史責任，進而把反思範圍從「文革」十年向前延伸……

《隨想錄》已成為那個時代的經典！至今，諸多歷史話題，依然與我們結伴而行。

古斯塔夫·莫羅《俄耳甫斯》

王 加



畫外 有音

不僅如此，畫中所有出現的事物均有其特定的隱喻。綠色的檸檬灌木象徵永恆

的重生；女子腳邊的烏龜在此暗指詩與音樂的永恆，因為在古代七弦琴的音箱便是由龜殼製成；與此同時，烏龜還意指寂靜，這也與雙唇緊閉，不再歌唱的俄耳甫斯頭顱不謀而合。而在所有畫中出現的象徵符號中，唯有巨石上的吹笛牧羊人寓意最為模糊。他們的出現是否意味着音樂和詩歌的生生不息已超越了俄耳甫斯之死？還是意指世間已沒有那些至高無上、受神啓發的天才詩人和音樂家的容身之所？只有當俄耳甫斯的天籟之音與七弦琴的裊裊餘音消失的那一刻，那些平庸的凡人藝術才得以生存？在符號學的開放性中，莫羅的《俄耳甫斯》實現了波德萊爾的理想，即暗示性的憂鬱之美：「同時具有熱烈和悲傷的情愫，有些含糊不清卻仍然可以猜測」。這幅具有極高獨創性，唯美且神秘的名作至今仍留給觀者無限的遐想。

畫作於一八六五年完成後，次年便入選參加了巴黎沙龍，並在一八六七年參展了在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畫中所蘊含的詩意想像，尤其是對俄耳甫斯頭顱與七弦琴與衆不同的解讀，為日後其他象徵主義畫家們提供了寶貴的素材模版。興盛於約一八八五年至一九一〇年間的象徵主義運動是一場反對提倡自然主義的印象派，拒絕對事物的原樣照搬和再現，傾向用回憶、暗示和想像來創作的文學與視覺運動。象徵主義畫家們認為色彩和線條本身即可以表達理念或情感，他們熱衷於以平面化的造型和大面積的色塊來描繪神秘的宗教或神話故事題材，並對死亡和罪惡主題情有獨鍾

。而神話中的俄耳甫斯因同時代表詩人、藝術家和神諭者，並暗喻生命對死亡的超越及音樂橫跨陰陽兩界的強大力量而被象徵主義畫家們視為藝術中最抽象和最靈性的表現形式。

一八九二至一八九七年間，巴黎曾舉辦過共計六屆名為「玫瑰十字沙龍」的展覽，參展的都是當時活躍在巴黎的一小衆象徵主義畫家們。其中，多位藝術家均從莫羅《俄耳甫斯》中汲取靈感，進而創作了題材相同，構圖和情節各異的作品。被收錄在第三屆玫瑰十字沙龍的讓·德爾維爾（Jean Delville）名作《俄耳甫斯之死》（Orphée Mort）便極具代表性。一張承載着俄耳甫斯俊美頭顱，嵌有華麗珠寶的七弦琴漂浮在湖藍色的水面上，德爾維爾選擇了一個比莫羅名作更為抽象，更帶有無盡遐想的簡約構圖來呈現詩人首級和他最鍾愛的七弦琴在海水中自由飄盪的場景，悲涼中透着無拘無束的浪漫氣息顯然借鑒了前輩莫羅的表達方式。

當玫瑰十字沙龍落幕後，另一位深受莫羅畫風影響，同為象徵主義畫派代表人物的奧迪隆·雷東（Odilon Redon）也步前輩的後塵完成了包括《俄耳甫斯》在內的數幅與讓·德爾維爾構圖幾乎完全相同的同題材作品。最大的區別在於對俄耳甫斯面部和七弦琴的細節描繪更為抽象，用色卻更加鮮艷明快，將詩人頭顱被畫家最具辨識度的絢爛花海中所環繞，頗有「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的意境。儘管象徵主義在漫長的西方藝術史中如流星般轉瞬即逝，畫家及其創作內容亦屬小衆範疇，但莫羅通過「俄耳甫斯之死」這一神話題材的引伸解讀不僅成為了象徵主義風格的範本，更是對此概念的成熟與發展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創意。

（下）

挑擔走江湖

陶 然



思 想 起

少年時代，印象最深之一，便是挑着扁擔周圍叫賣的當地小販了。那些小販，或者年輕力壯，多數是中年人。全都是為食奔忙的小人物，但各有各的特色。

經常路過我們家的，有一位是中年華人，笑嘻嘻的。多數是晚上九點左右，我們正在客廳聊天，突然便聽見門外街上傳來一陣「滴滴滴」聲，停一會，那「滴滴滴」又再響起，不斷重複，就明白，推車子的小販來了。那是用鍋鏟敲打鍋體發出的滴滴聲，我們私下就命名為「滴滴麵」，有時，星期天，父母例牌外出了，自然由大哥作主，我們就央求大哥，把小販叫停，去買麵，稱之為「滴滴麵，Mic Tekték」。那小販把手推四輪車停在路旁，抓起一把麵，丟進車子裏的小鍋，再把豆芽、豬肉丸、牛肉丸等等配料混在一起，煮起來，一會，煮熟了，撈起；然後，要甜醬、辣醬、芝麻醬等等，悉隨隨便。他的麵，在童年我的心目中是最好吃的了，世界第一等。但到了長大些，又吃了三姐同學在「新巴利」開的麵店，吃了那家的「鹽麵」，又覺得很好，又馬上覺得也是世界第一了！

其實，那時，各種麵吃了不少，中學是

喜歡和幾個同學打籃球，餓了渴了，學校鐵絲欄網外，經常站着幾個當地小販，兜售零食和飲料。囊中有零錢的時候，打到滿頭大汗，我們便掏錢買一杯冷飲，快活似神仙。餓了，便買一點小食，比如Rujak，那是南洋食物，有許多南洋水果，如芒果、番薯、楊桃、蓮霧等等，切成小片，拌上酸辣辣醬，吃下去，好好吃。那是童年印象，幾年前，我去棉蘭開會，紹弟見我懷舊，路過多峇湖畔，見到路邊有一位大嬸，蹲在那裏擺賣，便叫了一份，他說，他好久不吃這樣路邊的東西了。我一試之下，童年味道回不來了，只有童年時光若無還有，召喚我在利那間跌進那種朦朧氛圍裏去。

但有時口袋沒錢，有豪氣的同學便一拍胸口，去對面的麵店，我先幫你交，過幾天再還我。於是我便歡天喜地跟了去。

那麵店在新巴利，一家叫「良友」，是老牌子，一家叫「新新」，開店不久。兩家開在斜對面，大有爭奪生意之概。本來，母親上菜市場時，會帶我上良友吃一碗麵，但新新出現後，據說裝修和食物都好，於是很

多人便紛紛轉移陣地。母親也帶我去新新吃麵，我當然吃不出好壞，只要有得吃就好。可是，不久，社會上就流傳，有人白天在新新吃麵，那人喉嚨蠕動，那麵條從喉間不斷外流。於是便傳說鬧鬼，鬼傳就越厲害，也可能許多人又有創作欲，不久都沒平息。後來日子一久，大家似乎都忘了這件事情，慢慢又都恢復客似雲來。至於會不會是對手散布的流言？沒有實證，只好聽聽就算了。那也是已經好多年前的往事了，如煙，似霧。其實，這種傳聞我也聽說過，之前，說在「甲拉必丹」那裏，發生一件怪事，說是在一家人家那裏，吃飯的盤子飛上天花板上，不斷地轉動，就是不肯掉下來。人人在那裏言傳，個個神情恐怖，但我們都沒有親眼目睹。有人對我說，你不信？那就跑去看呀！加拉必丹離我們家不遠，但我就是沒去，並非完全不信，可能心裏有陰影：萬一實有其事呢？心理恐懼應該多過其他。

還聽說過一個故事，說一個漂亮的荷蘭少女，不知怎樣的，死活愛上一個當地男人，傳說是那男人使用降頭，落了愛情降，讓

那女的死心蹋地至死不悔。一般人也會覺得，怎麼可能呢？降頭之說，在東南亞流行，這說法有很大的市場。傳來傳去也有不少人相信，至於我，那時還小，不懂事，只是對美女野獸配感到好奇，尤其對降頭好奇，對那事實本身倒沒有什麼追究。

挑擔走過大街小巷的，除了滴滴麵之外，還有馬都拉族小販。每當傍晚時分，頭部和腰間分別纏着以巴迪布（Batik）製成的布帽和短圍裙，挑着他們獨有的兩頭向上彎起的扁擔，隨着他跨出的步伐，掛在扁擔上的鈴鐺便發出有節奏的響聲。那實際上是替代了沿途叫賣的辛苦，讓人遠遠聽到就明白，賣沙爹的來了。等他停下，彎腰開始用扇子撥碳爐的火苗時，我看見他一面翻轉擺在上面的肉串，他的腰間便露出一把彎刀。見我吃驚，他解釋，那是他們維護尊嚴的武器，輕易不會動用。

除此之外，挑擔做買賣的，還有專賣珍多冰或涼粉的，那人放下擔子，就從桶裏舀出珍多，或者涼粉，一塊塊的，加上冰塊，再加紅糖。南洋熱帶天氣，一喝之下，又涼

又清甜又解渴，真是天下美味！

後來在香港的印尼餐館，我也喜歡點珍多冰作為飯後甜品，可能因為久別重逢，原來的「古早味」早已淡忘，只覺得那種近似的滋味，不再仔細分辨，也可能味蕾已經無法分清區別，只是覺得好飲而已。有一回，在檳城，和印尼棉蘭一位朋友上街，他十分欣賞那裏一檔珍多冰，似乎每到檳城，例必光顧。事實上，這家的捧場客不少，須得排隊輪候。但我卻不覺得有多美味，普普通通而已，可能還是童年的味道常留心中不去？

還有一種挑擔者，是賣「肉丸豆腐」的（Baso Tahu），這種東西，是豆腐夾着豬肉，或者牛肉、牛皮、苦瓜等等，隨便一種。蒸熟後，再配上醬料，包括醬油、辣醬、醋等，拌在一起，吃一口，呀！又是天下美味！可是，自從那回，有個挑擔行走者在我家旁邊的小溪方便，並不洗手之後，父親問我們，看見了嗎？也就不敢再放肆了。現在挑擔行走已漸漸走入歷史，變成鋪頭的東西。直到後來很久，我走過萬水千山之後，重回萬隆，紹弟帶我去對面新開的食肆，其中一家便是專賣肉丸豆腐，好吃是好吃，是不是少吃多滋味？到底還是不是童年的味道？我都已經不大了在乎了。變味成了不是問題，只有當下的感覺，才是重要而真切。